

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研究

Dangdai Zhongguo
Yishi Xingtai Yanjiu

杨河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研究

杨河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杨河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301 - 20426 - 9

I. ①当… II. ①杨… III. ①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国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5849 号

- 书 名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
Dangdai Zhongguo Yishi Xingtai Yanjiu
- 著作责任者 杨 河 等著
- 责任编辑 倪宇洁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0426 - 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6 印张 530 千字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6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导论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 / 1

第一部分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章 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 / 37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展开 / 37

第二节 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蜕变 / 46

第三节 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教训 / 57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 / 61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 61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 / 65

第三节 “左”倾错误的影响与危害 / 69

第四节 拨乱反正与新局面的开创 / 72

第三章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 / 74

第一节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 / 74

第二节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 / 77

第三节 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启示 / 79

第四章 “意识形态终结论”评析 / 83

第一节 “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起源与流变 / 83

第二节 “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实质 / 86

第三节 既要反对“淡化”意识形态问题,也要防止“泛化”
意识形态问题 / 88

第二部分 时代的发展与要求

第五章 世情、国情、党情的历史性变化 / 101

- 第一节 时代主题的深刻变化 / 102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 115
- 第三节 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 / 135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 / 152

第六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任务的提出 / 168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 168
-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和谐思想 / 181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和谐”发展理念 / 192

第七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要求 / 198

- 第一节 题中应有之义 / 198
- 第二节 形势与任务 / 201
- 第三节 问题与思考 / 213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第八章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239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 / 239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 / 244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和发展 / 252

第九章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265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和酝酿 / 265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层次 / 266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 286

第十章 稳妥处理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基本关系 / 290

- 第一节 政治领域：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 290
- 第二节 思想领域：一元与多样 / 300
- 第三节 文化领域：多元与主导 / 305

第四节 学术领域:自由与批评 / 310

第五节 新闻领域:党性与人民性 / 315

第十一章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效机制 / 318

第一节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建设原则 / 318

第二节 坚持引领社会思潮的建设思路 / 329

第三节 坚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
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建设路径 / 336

结束语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 350

附录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 360

主要参考文献 / 403

后记 / 411

导论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



社会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与现实经济政治利益的关系,本来就历史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当西方学者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来概括社会意识的这种现实性属性时,立刻引起了正在创立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注意。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成了马克思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构成了唯物史观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的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中,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丰富。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经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社会要逐渐完成三个转型:在经济形态上,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政治形态上,从封建专制转向民主制度;在文化形态上,从古代转向近现代。为此,需要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改造,借以批判和改造的“武器”就是西学。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掌握了西学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擎起了中国近现代意识形态改造和重建的大旗,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开辟着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道路。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其重要时代背景在于“冷战”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冷战”的结束,使时代主题的变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展开中更加清晰地表现了出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展开中走上了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全面理解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积极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两个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生长因素。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历来如此。人类从来重视对自身社会意识状态的研究,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意识的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却是从西方近代开始的。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性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洞穴隐喻”和“高贵的谎言”,以及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的“四假相说”等,但是,明确提出“意识形态”(ideologie)这个概念的是法国近代哲学家托拉西。1801年前后,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赋予“意识形态”(在法语中,“ideologie”的原意是“观念学”)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即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观念的可靠基础,通过揭示心灵活动规律,对传统意识和知识体系做直接的感觉的还原检验,可以澄清和避免种种错误和虚假的观念;二是政治实践上的意义,即认为通过感觉的还原检验可以重新阐发政治、伦理、法律、道德等各学科的基本观念,建立起一种国民教育体系,使人性被认识,将法国变成理性和科学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哲学由于过分强调感觉的作用和贬斥宗教、形而上学及其他各种权威学说的偏见,威胁到了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存在,后来受到了质疑。拿破仑视之为一种空想、幻想,他甚至将对俄战争失败也部分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学者的说教,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意识形态空论家的教条——这种繁琐的形而上学费尽心思地认为寻找到了事物的第一因,并以此为基础为各民族立法,而不是使法律契合那些出自人类心灵和历史教训的知识——我们美丽的法兰西才不得不承受所有这些灾难”。^①拿破仑这种有影响的看法,使得“意识形态”被贬义地指称为具有不真实性含义的概念。

但是,从托拉西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种研究意向:说明社会意识与现实特别是与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正在形成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来讲,无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马克思曾经研读过托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也了解拿破仑对托拉西的意见。在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他和恩格斯最初也是从虚幻的不真实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他们批评鲍威尔“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这样一种技艺,即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其结果是,

^① 参阅[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7页。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进一步认为：“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②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③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意识形态，首先指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他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否定性”研究，始于对黑格尔宗教观和国家学说的批判，而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认为普遍性的观念绝对统治历史、历史从本质上讲就是观念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斗争可以归结为思想观念的斗争的看法，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过，与当时那些对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分析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和特征。

第一，在私有制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是统治阶级为本阶级利益和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观念体系。^④它的虚假性就在于通过普遍性的话语体系遮蔽了统治阶级特殊的阶级利益及其政治权力诉求，而将其表达为具有普遍形式的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达到全社会对阶级统治的认同，“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⑤

第二，造就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意识的认识论根源是长期存在的唯心史观，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⑥于是，“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⑦

第三，意识形态的真实根源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它不过是对社会的经济生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2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9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⑤ 同上书，第10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一种颠倒的反映。“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因此,在考察社会生活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

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认为,“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③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分工的形成,“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④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当意识“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的冲动发生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开始形成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的冲动,虽然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相关,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家头脑中凭空的想象,究其实质而言,是利益的需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⑤分工和私有制一方面造就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满足这种历史需要的条件。

从历史需要的方面来看,分工和私有制使得个人的特殊利益与个人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共同利益产生了矛盾,于是有了国家这种独立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代表“共同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④ 同上书,第82页。

⑤ 同上书,第84页。

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①

从满足这种历史需要条件的方面来看,分工和私有制也造就了一批为自己的阶级编织“关于自身幻想”的职业的思想家,于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②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贯穿在他们一生的理论活动中,从1845年前后一段时期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对意识形态本质特征的阐述,到1857年前后一段时期基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物化意识或商品拜物教本质特征的阐述,再到1871年前后一段时期基于人类学等的研究对各种肤浅的意识形态看法的批判和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阐述,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在这些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中,他们都始终将意识形态看做是“阶级意识”,但是在理论的分析上,却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特殊层面即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对意识形态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是对整个基于私有制之上的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统治批判的有机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意识在私有制阶段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表象,这种历史表象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虚假性”,这种“虚假性”的实质是理论与现实真实关系的颠倒,即真实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现实被貌似代表人类一般本性的理论所粉饰,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伦理价值披上了抽象的、普遍性的“全社会”的外衣。这种“虚假性”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异化现象(即人们本身之间的个人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的出现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被形式化为不同商品的等价交换时,对商品及其交换原则的普遍性的“崇拜”,便成了掩饰异化现象根源——私有制与分工的特有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普遍层面即一切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对意识形态是持非批判态度的。这种分析指出了一切意识形态形成的现实生活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指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国家则是实现这种统治地位表现的政治保证;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特殊引导或代替普遍,实现“调节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2页

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①达到对阶级存在和阶级统治合法性的论证;指出了只要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消失,意识形态将退出历史舞台,“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②

在这两个层面中,第二个层面的分析是一个总体理论即唯物史观框架,第一个层面可以纳入其中。从总体理论框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引申出三个逻辑的结论。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状态的领域。作为不同社会集团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观念体系,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有多少阶级社会,就有多少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时明确指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③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形态不可避免的过渡性,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又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样性的,多样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其中,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占着统治地位,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国家是它的政治实体,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观念”和“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具有主导性和支配性的话语权。

在近代西方历史的变迁中,随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逐渐统摄了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⑤昔日的贵族尽管还在大谈忠诚、荣誉等等,但是深知“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间阶级的经济繁荣密不可分”,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也会“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⑥,接受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观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614页。

④ 同上书,第27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70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这种历史情况用阿尔都塞的话讲就是:“意识形态并不是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谁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①

第二,过去历史上的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具有试图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表达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的“虚假性”,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更是这样。由于国家具有代表全民共同普遍利益的虚幻性,作为国家这种政治实体利益诉求之观念表达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鲜明地带有以特殊利益“冒充”普遍利益的“虚假性”。这种在主流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的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表达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的试图,在实践中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对诸多社会思潮的规范和整合。

第三,无产阶级也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做出这个结论,他实际是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纳入了对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中。在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为了团结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作斗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必须用暴力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③,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④在思想理论上论证和维护这个专政,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可以说,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始终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这个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以后,必然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主流。

尽管如此,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没有任何私利要维护,因而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⑥在其根本性上,它是拒绝虚假、要求真实的;在其现实性上,虽然无产阶级也需要“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但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发展利益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使得这里存在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也并非“虚假”,因此,对于这个阶级的思想观念,马克思只称之为“共产主义意识”,而没有称之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名称上的差异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很多地方没有区分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一个可能的

① 转引自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⑥ 同上书,第307页。

解释是：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这个阶级对立十分明显和尖锐的社会中，存在着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等诸多社会意识形态，尽管不能将它们其中的每一种观念或思想因素都等同于阶级意识，但是由于，第一，无论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艺术、哲学等的发展如何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是都没有脱离现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其成果也都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同程度地为现实服务；第二，在诸多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发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政治和法律思想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因为它们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着现实的经济基础，体现着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这样一来，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甚至不以思想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表现着一定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旨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分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必要，但是在实践中它们是共存和交织着的，这是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的历史现象。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其深厚的唯物史观底蕴和辩证的批判精神，在后来的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的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很多西方学者“说不尽”的话题，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诠释性学说。当代英国思想家大卫·麦克里兰指出，“正是由于他（指马克思——笔者注）的著作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概念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流传”，尽管“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远不清晰：他关于意识形态的评论多为顺便提到的，他从未进行系统的论述。然而主要的轮廓是清晰的”。^①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从“解释”世界走向了“改造”世界。

二

列宁生前没有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不了解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分析和批判，但是从对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的研读中，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在领导十月革命和致力于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一方面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狭隘阶级偏见和虚伪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建立自身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

在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等问题上，列宁提出了

^① [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孔兆政、蒋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很多重要的看法,其中比较主要的如下。

第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受历史条件制约、符合客观真理要求的科学理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之一。从其是科学的理论而言,它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巨大思想武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从其受历史条件制约而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必须是发展着的理论。

第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能由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而是对人类文明思想成果的自觉继承和总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④它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⑤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⑥这种灌输,就是“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⑦而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⑧

第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统一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这两大阶级对立存在的社会中,“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⑨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⑩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又不是简单化、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的,是否定中有肯定。“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⑪虚无主义产生不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③ 同上书,第312页。

④ 同上书,第317页。

⑤ 同上书,第317—318页。

⑥ 同上书,第363页。

⑦ 同上书,第342页。

⑧ 同上书,第325、327页。

⑨ 同上书,第326—327页。

⑩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⑪ 同上书,第299页。

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文化所积累的历史资源的基础上。

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看法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重大的发展,这种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作肯定性理解的看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观点。除此之外,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也大都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运动中的引领作用。

列宁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将它运用于俄国实际。

俄国是欧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带领人民群众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大主题,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论断,并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成功地实践了这个论断,完成了第一个主题。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较在俄国发动革命更为困难更为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在经济上,提出了要正确看待和利用商品货品关系,正确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既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又提出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由于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事物,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再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很多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

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的任务:一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俄国共产党内抵制和批判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形成党的意识形态;二是在夺取政权以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和整合社会思潮,形成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俄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其标志是列宁主义的形成,也没有来得及最终完成第二个方面的任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对什么是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始终在探索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是通过一定特征的制度实现的,他们按照唯物史观,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体制的特征提出了设想:当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成功以后,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将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照劳动量分配消费品;在平等合作和联合劳动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不再实行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等;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未来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

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①“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

历史是复杂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实际发生没有在英、法、德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是首先出现在俄国。当列宁在俄国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不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复杂的多样性的经济成分并存,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列宁清醒地看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③“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④

列宁做出这个论断的历史背景是:“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以后的第二年夏天,由于国内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组织叛军发动叛乱和国际上英、法、美、日等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危机。苏俄欧洲部分 3/4 的国土被占领,重要产粮区和工业原料产地沦陷,造成了经济困难、粮食奇缺、饥荒遍野的严重危机。

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苏维埃政权为此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方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适应战时需要、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非常措施,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工业和商业国有化,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粮食自由买卖,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成年人劳动义务制,推行平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等。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困难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应对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和过渡性,它为苏维埃政权在短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战争结束以后仍然实行这样的非常政策,并将其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就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脱离了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由于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最终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20 年下半年,发生了多起由富农发动的农民暴动;1921 年 2 月底 3 月初,曾经作为十月革命重要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生叛乱。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列宁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量所不及的。”^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80 页。

② 同上书,第 69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6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1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8 页。